

明清佛教“四大名山”信仰的形成

圣 凯

提 要：佛教“四大名山”的形成，是中国佛教信仰具有标志性的现象，是佛教信仰中国化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结果。本文概括了名山信仰具有“经典、地理、感应传说、塔寺、信徒、国家支持”六大要素，揭示了名山信仰的历史形成过程。

圣凯，哲学博士，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。

关键词：名山信仰 普陀山 五台山 峨眉山 九华山

一、从“五山十刹”到“四大名山”

佛教“四大名山”是五台山、峨眉山、普陀山、九华山，“四大名山”的形成是中国佛教走向民间社会的最重要象征。游方行脚、寻师访道是佛教徒的修学传统，在这一过程中，一些名山大寺逐渐成为参访中心。在宋代，江南佛教出现“五山十刹”之说。至明清时代，禅宗寺院渐渐走向衰落，僧俗大众逐渐以传统名山如五台山、峨眉山、普陀山、九华山为主要参访、进香之地，使名山的社會影响不断扩大，最终形成“四大名山”的基本格局^①。四大名山佛教的兴盛辉煌时代各有不同，但是将四大名山并称则在九华山地位的提升之时，大约在清康熙年间。

名山信仰的形成，是一个“经典、地理、感应传说、塔寺、信徒、国家支持”综合历史过程，是中国佛教信仰圈的最明显标志。这些要素可以从《清凉山志》、《峨眉山志》、《普陀山志》、《九华山志》得到印证，也是山志的主要构成部分。

二、名山信仰的六大要素

四大名山作为菩萨道场，经典记载是神圣信仰的来源，是“四大名山”能够形成的首要条件。虽然中国其他名山亦具有其他条件，唯独不具此“经典”要素，则无法形成名山的信仰圈。晋译《华严经·菩萨住处品》记载：“东北方有菩萨住处，名清凉山。过去诸菩萨常于中住，彼现有菩萨，名文殊师利，有一万菩萨眷属，常为说法。”^②唐译《文殊师利法华经》记载：“我灭度后，于此瞻部洲东北方，有国名大

振那，其国中有山，号曰五顶。文殊师利童子游行居住，为诸众生于中说法。”^③结合二经的记载，文殊菩萨道场在大振那国的五顶山或清凉山。晋译《华严经》记载：“西南方有菩萨住处，名树提光明山，过去诸菩萨常于中住，彼现有菩萨名贤首，有三千菩萨眷属，常为说法。”^④唐译《华严经》则称为贤胜菩萨^⑤，但是“光明山”作为菩萨道场是相同的。唐译《华严经》说：“于此南方，有山名补怛洛迦，彼有菩萨名观自在。”^⑥《大唐西域记》卷10记载：“秣剌耶山东有布怛洛迦山……观自在菩萨往来游舍。”^⑦《普门品》中对观世音菩萨寻声救苦功德的描述，印度的布怛洛迦山实有其山，但是观世音菩萨的慈悲精神与海上守护神的特征，则成为信仰的渊源。九华山作为地藏菩萨道场，则来自新罗僧人金地藏的应化事迹。

作为名山的地理条件，必须具备两个条件：一、要符合经典描述的地理特征；二、必须具有建立众多寺院的空间，能够成为清净的修行道场。如澄观根据他在五台山10年的亲自考察，结合印度东北方的五台山有气候严寒、地有五顶的特点，澄观说：“清凉山，即代州雁门郡五台山也，于中现有清凉寺。以岁积坚冰，夏仍飞雪，曾无炎暑，故曰清凉。五峰耸出，顶无林木，有如垒土之台，故曰五台。”^⑧山顶不生林木，远远望去，似如垒土之台，故曰五台。以地势高耸，烟雾常积，台顶常隐于雾幕之后，不甚分明，时至天清云散，才有时而现。《古清凉传》作者慧祥对五台山在方位、气候上的条件，与《华严经》中的文殊寓所——清凉山如此雷同，

曾表示殊胜和赞叹。如此一处绝尘之境，故《括地志》云：“其山……灵岳神巖，非薄俗可栖。止者，悉是栖禅之士，思玄之流。及夫法雷震音，芳烟四合，慈觉之心，邈然自远。”^⑨可见，五台山不仅具有神秘和神圣的氛围，也是修道参禅的好地方。峨眉山位居西南，而且昼有“佛光”，夜有“圣灯”，光明常住，符合“光明山”的地理特征。而普陀山，如《补陀洛迦山传题辞》说：

始自唐朝梵僧来睹神变，而补陀洛迦山之名，遂传焉。盘礴于东越之境，宵芒乎巨浸之中，石洞嵌岩，林峦清邃，有道者居之，而阿兰若兆兴焉。自非好奇探幽，乘桴泛槎者，罕能至也。^⑩

普陀山的海岛风光及其地理特点，无疑是普陀洛迦名称的来源。九华山亦是奇秀，高出云表，峰峦屈状，耸立如莲华，其数有九，故称九华山。

随着四大菩萨经典的传入，各种有关菩萨的传说亦在汉地流传。同时，僧人、信徒在名山的各种宗教体验成为菩萨应验的事迹，从虔诚教徒的口中流传出来，于是不断地激发对菩萨的信仰热情，也推动人们前来朝访巡礼。五台山的文殊化身、普陀山梵音洞都非常有号召力，吸引无数善男信女前往朝拜。如《佛祖统纪》载：宋太祖乾德四年（966），“嘉州屡奏白水寺普贤相见”^⑪，宋太宗“太平兴国七年（982），嘉州通判王衮奏：近往峨眉提点白水寺修造，见瓦屋山皆变金色，中有丈六金身普贤，次日中午见罗汉二身乘紫云行空中”，“普贤祥瑞”使峨眉山获得北宋皇帝的许多直接支持，采取利用和保护佛教的措施，对峨眉山普贤菩萨道场的形成，无疑起了最后促成的关键性作用。所以，传说感应是名山信仰的发展动力。

作为名山必须具有规模效应，林立的塔寺佛像才能引发信仰的热潮。五台山在北魏开始有佛教的传播，入齐之后，“宇内塔寺，将四十千；此中伽蓝，数过二百。又割八州之税，以供山众衣药之资焉。据此而详，则仙居灵贍，故触地而繁矣”^⑫。时有灵辨法师造《华严论》100卷，为中国佛教注疏《华严经》之嚆矢，五台山逐渐成为中国北方研习《华严经》的圣地。至隋唐时代，太宗于此建度僧，高宗敕令蠲除税敛，武后还建塔供养，令西京会昌寺沙门会曠于龙朔二年（662）撰成《清凉山略传》1卷，又令僧统德感国师常住五台山清凉寺。唐开元年间，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文殊信仰盛极一时，形成文殊道场，五

台山寺院规模得到极大的扩张。元代和清代推崇密教，五台山密教寺院剧增。明万历年间，五台山有寺院300余座。五世纪初，慧持在峨眉山创建普贤寺开始；唐以后，峨眉山的“佛光”现象逐渐传扬。随着人们以“普贤祥瑞”来解说“佛光”，再加上北宋统治者的推波助澜，峨眉山逐渐形成普贤道场。明代是峨眉山佛教的鼎盛时期，寺院多达170余座，常住僧侣达3000多人，礼佛信众不计其数。普陀山从唐大中元年（847）一名印度高僧来山定居开始，后梁贞明二年（916），日僧慧锷建“不肯去观音院”，观世音菩萨信仰日益盛行，寺院建筑迅速增加。至道光十二年（1832），依王鼎劬《重修南海普陀山志序》记载：“山中僧寮不下70余所，缁流及外方挂单约1000余众”^⑬。唐至德（756—758），九华乡绅诸葛节等为金乔觉创建化城寺，为九华山佛教的开端，逐渐形成“九华一千寺，撒在云雾中”之说。清代周文赟在《九华山志·化城市僧寮记》曾说，天下佛寺之盛，千僧极矣。可见寺院星罗棋布，高僧云集，法会隆重，佛事频繁，如此规模效应才能具有名山的信仰气氛。

一座名山的影响扩大，离不开皇帝和朝廷的支持；“四大名山”的形成和影响的扩大，更加如此。在五台山，北齐诸帝曾“割八州之税，以供山众衣药之资”；不空三藏借助代宗的权力，大力推广文殊信仰，大历四年（769），代宗批准不空三藏的奏疏，尊文殊菩萨为天下寺宇食堂中的“上座”，钦定普贤菩萨、观音菩萨为“侍者”，从而确定五台山为名山之首^⑭。

峨眉山得到北宋皇帝的种种支持：乾德四年（966），宋太祖命内侍张重前往普贤寺庄严佛像；太平兴国五年（980）正月，宋太宗敕内侍张仁赞往成都铸金铜普贤像，高二丈，安奉在普贤寺的白水，建造大阁以覆之，于是重修白水普贤、黑水、华严、中峰乾明、光相等五寺；雍熙四年（987），宋太宗敕内侍送宝冠、璎珞、袈裟往普贤寺；端拱二年（989），敕内侍谢保意，带领工匠和黄金300两饰普贤像，再修寺宇，并赐御制文集；大中祥符四年（1011），宋真宗诏赐黄金3000两，增修峨眉山普贤寺，设三万僧斋，每年度僧4人。这样，大大地扩张了峨眉山佛教的声势，减弱了道教的力量，在皇权的支持下，峨眉山在宋代成为闻名中外的普贤道场。明太祖尊峨眉山宝昙和尚为国师；明神宗敕建无梁砖殿以保护普贤骑象，亲书“圣寿万年寺”之额；他又颁诏在山顶新建铜殿，赐以“永时华藏寺”之额。清代康熙皇帝还为峨眉山的寺院撰写诗联匾

额，顺治赏赐锡瓦殿明正和尚永乐年间的铜板精印《北藏经》1部。明清帝王的直接支持，促进了峨眉山佛教寺院的增长和交通环境的改善，为信徒朝拜提供了许多方便。

普陀山佛教的发展，主要是受到明清历代帝王的重视。明神宗数度赐藏经与普陀山，崇祯命国戚田弘遇捧御香祈福观音大士；康熙二十八年（1689），命近侍赐帑金1000两，建盖山寺；三十八年（1699），康熙驾巡杭州，差太监带着黄金1000两，分赐前后两寺，到普陀山进香，而且传旨“山中乃朝廷香火”；雍正九年（1731），赐帑金70000两，重建前后两寺。所以，普陀山佛教地位的上升与明清帝王的政治关照是联系在一起的。

九华佛教亦是在明清时代发展起来的。明万历年间，明神宗两次颁赐化城寺藏经；康熙三次遣内侍来进香，并赐额“九华圣境”；乾隆四十一年（1776），向化城寺赐额“芬陀普教”。

三、明清时代“四大名山”的确立

“天下名山僧建多”，名山往往是中国佛教的中心，但是每个时代的佛教名山各有不同。如刘禹锡《故衡岳律大师湘潭唐兴寺俨公碑》对当时佛教进行总结：

佛法在九州间，随其方而化，中夏之汨于荣利，破荣莫若妙觉，故言禅寂者嵩山。北方之人锐以武力，懾武者莫若示现；故言神道者，宗清凉山。南方之人剽而轻，制轻莫若威仪；故言律藏者，宗衡山。是三名山为庄严国。^①

刘禹锡指出当时的中国佛教名山是嵩山，以禅宗为中心；五台山，以神秘感应为中心；衡山，以持戒威仪为中心。

宋代的“五山十刹”是对江南禅林的归纳，与“名山”相距甚大。至明代，则出现三大名山之说。万历三十三年（1605），礼部尚书李长春《峨眉大佛寺落成颂并序》说：“盖闻震旦国中有道场三：曰峨眉，曰五台，曰普陀，鼎立宇内，为人天津梁。”^②五台山、普陀山、峨眉山并列，称为三大名山，是明代的共识。但是，到了康熙年间（1662—1722），逐渐出现四大名山的说法。如康熙二十六年（1687），按察使曹素微《峨眉山序》说：“三峨高出五岳，秀甲九州，震旦第一山也。顾其山不入五岳，而列于四大名山之一。”^③康熙三十七年（1698），裘琯在《南海普陀山志》说：

文殊、普贤、观音、地藏，皆久成佛道

之法身大士。以度生心切，遍界现身，又欲众生投诚有地，故文殊示应迹于五台，普贤示应迹于峨眉，观音、地藏示应迹于普陀、九华也。世有以地、水、火、风分配四大名山者，乃知地、水、火、风为四大之义，而以己见妄会之，不可为据。^④

康熙年间不仅出现了四大名山，而且以地、水、火、风四大进行附会性质的解释。但是，“四大名山”在社会广泛流行，应该在康熙之后。

“四大名山”的形成，是中国佛教信仰具有标志性的现象，是佛教信仰中国化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结果。“四大名山”的信仰形态，是民众信仰方式的表现，是善男信女表达宗教感情的朝拜地，是佛教文化的最生动体现。

（责任编辑：又小易）

① 潘桂明：《中国居士佛教史》，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2000年，第818页。

② 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卷第29，《大正藏》第9卷，第590页上。

③ 《佛说文殊师利法宝陀罗尼经》，《大正藏》第20卷，第791页下。

④ 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卷29，《大正藏》第9卷，第590页上。

⑤ 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卷45，《大正藏》第10卷，第241页中。

⑥ 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卷68，《大正藏》第10卷，第366页下。

⑦ 《大唐西域记》卷10，《大正藏》第51卷，第932页上。

⑧ 《大方广佛华严经疏》卷47，《大正藏》第35卷，第859页下。

⑨ 《古清凉传》卷上，《大正藏》第51卷，第1093页上。

⑩ 《补陀洛迦山传题辞》，《大正藏》第51卷，第1135页中。

⑪ 《佛祖统纪》卷43，《大正藏》第49卷，第395页中、398页上。

⑫ 《古清凉传》卷上，《大正藏》第51卷，第1094页上。

⑬ 《普陀山志》，南京：江苏广陵古籍出版社，1993年，第625页。

⑭ 《贞元新定释教目录》卷16，《大正藏》第55卷，第887页下。

⑮ 《全唐文》卷610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0年，第2730—2731页。

⑯ 《峨眉山志》卷6，扬州：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，1997年，第286页。

⑰ 《峨眉山志》卷首，第7页。

⑱ 《普陀山志》卷6，扬州：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，1993年，第558页。